

性，也可以保證我們人類思維的複雜多樣性及其自由。但是文云乎者，必需要我們自己去讀懂，需要通過研究，理解古人的心思，否則只見一堆廢紙，只剩下考古遺物而已。熱切希望更多人去研究經學文獻。

（後記：研討會上有幸得到李威熊老師的評論指點，現在按照李老師的意見修改了個別字詞。至於內容方面根本性的缺陷，無法彌縫，祇好仍舊。謹對李老師的賜教表示感謝。）

「孔學與二十一世紀」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1年9月28~29日

## 清代春秋公羊學張三世變易的歷史思想

王玉華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春秋公羊學的三世史觀，是公羊學解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並規劃國家未來藍圖的最好依據，原本只是孔子對於《春秋》不同時代的史事，其記載的書法有所不同，以見年遠恩淺，時近隱諱，標明《春秋》用辭的不同，藉此隱約其辭，微加諷喻以避禍。至何休的三科九旨始提出由「據亂」到「升平」至「太平」三世歷史漸進發展的思想，開啓了春秋公羊學者以歷史為鑑的史觀精神，肯定人類隨著歷史的邁進，其文明與生活定當與時俱進，由蠻荒時代文明羶狁，到太平時代遠近大小若一，文化鼎盛，民族和平共榮的理想世界，這是春秋公羊學者對理想王道的期許。清代公羊學者引用三世之思想，亦須先釐清三世思想之意涵，了解三世歷史變化思想之源由，當能配合其時代問題，提出獨到的詮解與運用，更由於三世思想在清朝特殊的政治環境中，面對西方思潮的挑戰，為清末之儒者引用傳統經學思想以因應世界局勢之轉變，因此，更突顯其地位高於「存三統」及「異內外」等公羊學之義例，成為清代公羊學者論述之重心，故本文先闡述春秋公羊學三世思想之精義，繼而說明清代公羊學者對三世思想之應用，以

見三世思想在清末世局紛亂中所發揮的撥亂效用。

## 壹、張三世思想之精義

張三世思想源於何休對《公羊傳》「三世異辭」的闡發，指出《春秋》撥亂起治的三個步驟為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由文明羶狁到文教大備，呈現出變易進步的歷史觀點。其前身為董仲舒的《春秋》三等的歷史階段論，將《春秋》筆法所刻劃的時代區分為「見三世」、「聞四世」、「傳聞五世」三個時代，表示記錄史事之用辭與時代之遠近配合，發揮「重近略遠」的史鑑精神<sup>1</sup>。張三世思想於公羊學之內外華夷觀常配合使用，在清朝滿族入主中國，及西方列強不斷侵凌的歷史背景中，呈現出特殊的時代意涵，公羊學者將「三世異辭」與其時代問題結合，成為劃分歷史之依據，也成為撥亂起治之步驟，進而形成未來政治規劃之藍圖，因此，其影響清代之政治社會深遠。底下分兩點論述張三世思想之精義：第一點為辭與情俱之筆法；第二點為變易進步之史觀。

### 一、辭與情俱之筆法

《公羊傳》闡發《春秋》有「三世異辭」的書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sup>2</sup>表達因應時代的遠近，記錄史事之筆法自

<sup>1</sup> 參閱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空間上的『自近及遠』，與前面『辭與情俱』在時間上所顯示的『重近略遠』，或可能是《春秋》歷史本質所引申出的『史鑑』精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0月初版，P.13。

<sup>2</sup> 見清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第三刷，P.17、P.48、P.357。

有不同，甚至對於時代久遠之史事已「無聞焉爾」<sup>3</sup>，《公羊傳》定公元年指明孔子忌時遠害，因此：

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孔子以褒貶之筆法論述史事，雖然以素王實行褒貶進退之權，但其只是藉史筆以批駁史事，並未具備實際之權位，為避免觸怒時君而遭致橫禍，故距離己世愈近的史事，論述的筆法愈隱微，而對於時代久遠之事則可以多加論述，然而受時代久遠，歷史資料不免湮滅或損壞之影響，因此「無聞焉爾」之事在所難免。《春秋》之筆法為孔子政治思想之寄託，因此，公羊學者在詮解《春秋》經文時，特別著重其隱藏的微言對其加以論述，往往於簡單的文字中闡發出重要的思想內涵，「三世異辭」本來只是史事記載的單純筆法，隨著時間之遠近因素，歷史之記錄必然有其差別，尤其在紛亂的時代中，若要發揮著史者的政治思想，更應審慎小心，將批判褒貶之意寓藏於文辭中，以待後世子孫取法，否則一旦受到時君所忌刻，不免橫遭禍事，甚而使著史之意湮滅不彰，「三世異辭」之用意即是呈顯史筆之隱微，將《春秋》大義寄託於文辭而表露，使著史者保身遠禍卻又能抒發其意。

公羊學者便透過《春秋》隱微的用辭闡發其中的深意，由記載史事之筆法衍生成三個階段的歷史論述，使後世於借鑑歷史時有所依憑。董仲舒首論「《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藉此三個階段之歷史記載「屈申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而知遠近親疏、貴賤輕重等事之區別，更能妥善運用史事之記載「義不訕上，智不危身」隱微其辭而安身立命。董仲舒將《春秋》所記載的史事區分為「見」、「聞」、「傳

<sup>3</sup> 同注2。隱公二年十月：「紀子伯、莒子盟於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文公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P.26、P.65、P.180。

聞」三個階段，並指明此三階段的歷史劃分主要是依據《春秋》記錄史事之用辭與實際的歷史情狀相符合，即所謂的「辭與情俱」，此乃是對自己親身經歷之史事，由於切己深遠，唯恐因批駁史事而遭罪，因此「微其辭」以避害，將史事的批判透過隱微的用辭寄寓於《春秋》中；而對於距己稍遠的年代，由於自己感受深刻，因此，記錄史事時「痛其禍」以顯示事件對己身之影響仍然存在；至於時代久遠的史事，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影響已減弱，反而可以詳細的論述，無須忌諱避害，由於事件距離己世已遙遠，因此「殺其恩」<sup>4</sup>以批駁史事，呼籲後世子孫記取歷史之教訓。董仲舒雖將《春秋》區分成三個歷史階段，但其公羊學之重心主要在發揮三統思想、受命改制及陰陽災異上，因此，並沒有發展出特殊的三世思想意涵。但就其區分《春秋》為三等的歷史階段論述而言，卻能顯現《春秋》辨別「內外、賢不肖」<sup>5</sup>之尊卑等級，將《春秋》以仁義禮法為判準的道德批判呈現出來，配合史事記錄的時間因素，使歷史之事件蘊涵道德之價值，後世子孫始能由史事之論述中學習前人之經驗，取鑑歷史之精神，而能在現實生活中安身立命。

史書對歷史事件的記錄本在忠實傳達事件發生的原由及過程，使閱讀歷史之人瞭解事件發生的本末，並能藉此闡發歷史之深意，使後人靈活運用史事之教訓。「辭與情俱」的筆法，一方面呈顯歷史事件之實際情狀，一方面將著史者與歷史事件聯結起來，距己切近之事件對著史者之影響自然較深遠，因此，無論史事之記載或史事本身與著史者之關係都相對的密切，因而「微其辭」得以安其身；至於距己稍遠或距己久遠之史事，其論述之用辭則可以大膽而詳實，「痛其禍」、「殺其恩」都不致於遭受禍事，因此，不必特別忌諱，故董仲舒藉《春

<sup>4</sup> 見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台北：中華書局，1948年5月台四版，卷一P.3。

<sup>5</sup> 同注4。〈楚莊王〉：「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卷一P.3-4。

秋》「辭與情俱」之筆法顯現「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之大義，區分歷史為三個階段，其親疏貴賤尊卑之等有所不同，提出其歷史分劃之觀點。

## 二、變易進步之史觀

三世思想之成形始於何休對三世異辭的詮解，何休提出公羊學之三科九旨，以「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為二科六旨，說明《春秋》撥亂起治的歷史進程為「治起於衰亂之中」，漸於「見治升平」，最後及於「著治太平」，而有「衰亂」、「升平」、「太平」三世的思想出現。並肯定人類之文明將隨著歷史的進展而逐漸完善：起初文教未成，人民用心粗疏，因此，先將撥亂起治的用心集中於治理國家內部的事務「內其國而外諸夏」，待國家內部治理完善，當能妥善處理華夏諸國之事務「先詳內而後治外」。隨著歷史發展的軌跡漸漸擴大撥亂起治之用心，處理諸夏各國之事務「內諸夏而外夷狄」，將華夏諸國統合在一起，保持中原文化之優異特質，避免夷狄的侵擾，使文明漸漸發展，教化的力量逐漸展現，人心因而敦厚良善。藉著道德文化導化夷狄「用心尤深而詳」，漸致文明發展教化大備，使其渴慕華夏優異之文化，泯除華夷之種族界線，「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各民族平等相處，和平共榮，以文化的力量超越血統的分界，使夷狄大化進至於華夏之文化水準，達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境界。

何休提出三世思想的原意，是指《春秋》由近而遠撥亂起治的步驟，配合公羊學以文化為分辨的內外華夷觀點，引用中國文德教化之王道仁政理想，透過文明及教化弭平種族間的差異，展現華夏文化兼容並包之特性，以文明及仁德同化邊夷之族，達至世界一家，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清代公羊學者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欲從傳統思想中找尋解救之方，唯有公羊學以文化為區分之華夷觀點，配合政教施行之步驟，由文化粗疏之據亂世，進至文教漸行之升平世，最後達於文

教大備之太平世，透過文明教化的力量，使華夷各族同沐於華夏鼎盛的文明教化中，共亟於太平。中國與西方各國一樣受文明教化所習染，共進於文化強盛的太平世代，因此，公羊學者能以寬容的心看待西方的文化，進而學習西方文化之優點，效法西方之政治與學風而變法圖強。魏源、康有為等先見之士目睹西方政治之進步，西學之優長，運用公羊學文化之華夷觀，因此，能虛心效法西學，尋求自強之道，更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將己世定義於「升平世」，配合公羊學三世進步變易之歷史思想，從文教漸成「見治升平」希望能勵精圖治，努力改革，逐漸達至「著治太平」之理想境界。清代之公羊學者咸以經世濟民為曠遠的政治懷抱，因此，突顯公羊學之三世思想的重要性，將三世進步之歷史變易觀點運用於政治規劃上，自由闡發其理想的政治形態，企圖勾勒出理想的政治藍圖，因此，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失敗後便將其政治理想寄託於「大同」中，即是源於公羊學三世思想之政治規劃，賦予公羊學者政治理想實踐的美好遠景，無論據亂世或升平世，其終究之歷史進程總會導向於世界大同之太平理想，再配合〈禮運〉「大同」之思想，形成「大同書」之理想，將三世進步之歷史變革作一完滿的結局。

公羊學之三世思想指明歷史在不斷的變化改易中，人類之文明也跟著不斷地進化，由粗疏而精細，由蠻荒而進步，政教之施行亦配合內外遠近之關係，由近及遠，由內而外，最後不分遠近大小，文化齊達於鼎盛，人人平等相處，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戰爭侵奪之災禍自然消弭於無形，世界共享和平安樂之生活，如此理想的世界榮景，藉由三世進步之歷史思想始能逐步實現，一一達成。

## 貳、張三世思想之發揮

清代公羊學者對三世思想的發揮者主要分為單純的三世思想之運用及繁複化三世思想之運用，單純的三世思想運用是從何休三世思

想衍生而來，配合其時代的問題，及其對歷史的觀點，將歷史發展的進程分為簡單的三世模式，藉此以議論時政，並規劃未來政治發展之方向。繁複化的三世思想模式則是配合世界上各國政治發展的現實，希望將所有的政治情況容納入三世思想中，由於世界各國政治之發展各異，為了圓滿解釋所有的政治情勢，因而配合三統及文質，將三世思想繁複化以因應政治之現實狀況。

## 一、單純三世思想之詮解

莊存與公羊學之重點放在內外問題之處理上，利用公羊學以文化為區分的華夷觀，替漢化之滿清政權正名，對通三統及張三世義例的運用則非常簡略。他對三世歷史變易改革的觀點，只著眼於曆法正朔制度的改易，不包含任何時代進步的先進思想，這與他運用存三統義例的態度一樣，雖接受制度更革的需要，卻少言變易。因為乾隆時期，清朝正當隆盛，任何變易思想都是莊存與所無法接受的，他極力所推崇的是尊奉王室的思想，因此，對三世說也不多作發揮，而且在天下承平之時代侈言改革似乎是多此一舉，莊存與因而簡略地論及：

撥亂啟治，漸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sup>6</sup>

只把三世思想當作《春秋》撥亂起治的步驟，並未加以衍申其義。莊存與依據董仲舒及何休的思想詮解《公羊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表明「三世異辭」之運用乃因為時間及年代的遠近不同，史料之詳略亦不同，事件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有深淺之別，記

<sup>6</sup> 見莊存與《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皇清經解》第二冊：「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略之文。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12月影印，P.781。

載史事的用辭自然不同。董仲舒將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視為非僵化的三階段歷史事實，將《春秋》分為「見、聞、傳聞」三等。

何休則因時間及時代遠近之不同強調記錄史事時：「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採用異辭以表示不同的人倫等分，說明孔子修《春秋》時對於距己切近的定、哀二世多採用委婉隱晦的筆法以避諱時君之忌恨，而對於距離自己較遠的年代如隱、桓二世則概述時事，直言論說。然而，後人仍能從他微妙曲折的用辭中，探求其深藏的隱意，將隱微的史事褒貶，及人倫尊卑等分之觀念寄託於《春秋》的文辭中。何休採用進化變易的歷史觀點，將史實區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莊存與則將其簡單地解說成是撥亂起治達於升平的步驟，更將天象之月數與《春秋》歷史所記載之十二位君王相比擬，藉此顯示《春秋》取法天道，備足法式，為後世撥亂反正取法之要典。其「十二有象」是指《春秋》十二位君王的數目與一年十二個月相一致，符合天象之數目，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所言：

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

莊存與之三世思想完全不涉及何休三世歷史變易進步的觀點，其對三世義例的運用雖然非常簡略，也稱不上獨出新意，但仍具有啟發後世應用春秋公羊思想的先導作用，為清代公羊學者引用三世思想的肇始者。

孔廣森對三世說也不甚重視，只是執著於考據的觀點，認為魯襄公應劃入所見世，對於何休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變易改革的歷史進步觀點，視為違礙之論，贊同顏安樂對《春秋》十二公的區分：

《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顏安樂以為……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成、

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sup>7</sup>

三世歷史進化的觀點在此完全喪失，只成為魯國君主究竟如何劃分的問題，其汲汲於探究魯襄公應劃入何世，議論《春秋》書日與不書日的考證之爭，對於《春秋》隱含的微言大義毫不理會，失卻春秋公羊思想藉由三世歷史進步變易的觀點，以解決其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並藉此規劃政治施行的進程，強調與時俱進的變易精神。

清朝中葉的劉逢祿對張三世思想則有較深入的發揮，認為《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是藉此：

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sup>8</sup>

運用三世歷史變易進步之觀點彰顯《春秋》教化之功，其政治之施行應由內而外依序進行，其文明教化之進展亦由粗疏而精細，漸至文教大備，教化功成之境，因此，雖然就歷史事實而言，春秋時代是愈到後世，世局愈昏亂，但為了彰顯禮義教化之功用，《春秋》所記

<sup>7</sup> 見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皇清經解》第四冊：「《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12月影印，P.703-704。

<sup>8</sup> 見劉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張三世例第一〉，《皇清經解》第七冊：「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詞，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12月影印，P.371。

載之史事則是愈到後世，文明教化反而愈進步，終至文教鼎盛，天下太平之境界。所以，劉逢祿認為：

《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sup>9</sup>

《春秋》為聖人撥亂反正之法，由「據亂」而進於「升平」再進於「太平」為天地變易進步道理之展現，人類之文明亦循此進化之跡不斷創進奮發，朝向太平理想發展。

劉逢祿的張三世思想是引申何休注解《公羊傳》文中三世歷史變易的觀點，運用於社會進化的變革，於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次明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說明三世異辭之書法表明「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sup>10</sup>運用禮義教化治理萬民，達至天下太平之理想。另外，於桓公五年引用何休注針對所傳聞世和所聞世書法的不同，詮解齊侯、鄭伯相會於紀之史事：

至所聞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

<sup>9</sup> 同注8〈張三世例第一〉：「《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於凡有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P.371。

<sup>10</sup> 同注8〈張三世例第一〉：「隱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桓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P.370-371。

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sup>11</sup>

桓公五年屬所傳聞世，按何休的書法，在傳聞世只對魯國內部的事記載詳細，對華夏各諸侯國的事記載簡略；至所聞世進到「著治升平」，《春秋》書法也跟著改變，對諸夏的事詳細記載「乃書外離會」，齊侯、鄭伯到紀會紀侯的事，現在卻照所聞世的書法記載，原因是此次會見只屬於一般低調的會見（離會）<sup>12</sup>，不屬重要的盟會，故變文處理以避免書法的不妥。劉逢祿引證許多條目，說明張三世思想是從歷史變易的觀點解說春秋公羊學的要義，表明春秋公羊學對二百四十二年的魯國史事，其書法不是凝滯不動的，而是隨著時間的遠近，恩義的深淺，書法也有所不同，對待民族的關係也採取不同的態度，還不時引用「實與而文不與」及「變文」的手法，描述《春秋》複雜的歷史。這是劉逢祿對三世變易歷史進步思想的衍生，由於歷史將不斷地變化，人類社會也當不斷地進步以符合歷史的腳步，因此，三世變易之歷史進步觀點，為《春秋》施行文明教化的發展進程，使天下能由據亂世禮義未具，進而達至升平世禮義漸成，終至太平世禮義完備之理想文明社會。

宋翔鳳對張三世義例的運用，基本上與前面幾位公羊學家並無不同，但他特別強調太平政治的理想就是堯舜之治《論語說義》：

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為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言太平之世，群聖相繼，效至捷也。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為一。

其倡言三世之義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撥亂反正，循致理想的堯舜

<sup>11</sup> 同注8〈張三世例第一〉：「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注《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P.370。

<sup>12</sup> 離代表附著、附麗，離會引申為兩國國君或使者相會。

太平之治。

龔自珍對張三世義例的運用展現於論政的警世作用上，以「三等之世」說明「治世」、「亂世」、「衰世」人才的區別，針對衰世發出警語，並特別注重衰世人才流落於山野的問題，表明民族危機已趨於緊迫，吏治敗壞，朝政昏亂，若不知變革，將有大亂興起。其以早時、午時、昏時說明封建統治的三個階段，提醒衰世已經來臨，《尊隱》：

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早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當其早時，「夫日胎於溟涬，浴於東海，……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但有鄙夫，皂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象徵朝廷統治的力量仍然隆盛，封建勢力尚處於上升的階段，皇帝仍專制地掌控全國，而鄙夫、皂隸等卑賤的人此時仍未受到重視。至日之午時，「日之亭午，乃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百寶萬貨，奔命喘塞，汗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壘士，天命不猶，俱草木死。」此時朝廷統治的力量仍未崩解，封建勢力尚控制著局面，禮樂制度及禮法秩序尚未毀壞，朝廷所在的京師仍是人才物力集中的地方，在野的壘士對統治者仍無法構成威脅。到了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貴人故家，烝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京師之氣泄；……則府於野矣。」到這個時候，有識見，有作為的人才都誕生於民間，他們才是應當受到朝廷重視信賴的能臣，但是統治者卻重用小人，壓迫人才，因此「山中」的力量便起了大變化，「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果然不久清朝便爆發太平天國起義的動亂，使清朝政局動盪不安，影響遍及數省，龔自珍早就引用三世思想之詮解，提醒衰世既臨

的問題，這是龔自珍援引春秋公羊三世思想以經論政的實例，開啓了後世春秋公羊學者以三世史觀認知歷史，解釋古史的演變，並藉此規劃未來政治的新制及美好的遠景。

魏源對張三世義例的應用，他有自己特殊的三世觀點，以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說明歷史是循環變化的模式，在一個個的氣運中又分為數個階段，乃有後學關於歷史進化、退化，複雜模式的產生《古微堂內集》：

禪讓一局也、征誅一局也、傳子傳賢一局也。……三皇以後、秦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

《老子本義》：

今夫赤子哺乳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實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為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為也。

魏源認為「時不同，無為亦不同」引用變易的事實詮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指出歷史循環的模式以茲後世引用。

## 二、繁複化之三世思想

清代公羊學者面對時代的巨變，急於思索救急之方，因此，亟於確立撥亂反正之步驟，三世思想提供其施政的順序，也提出變易之歷史觀點，為求變求治之清代公羊學者奠定理論的依據，但此時三世思想之運用已超出何休單純之三世模式，配合歷史的詮解及政治現實之應用，複雜殊異之三世思想應運產生。龔自珍「洪範八政配三世」之思想隱約已提出繁複化之詮解，將八政與三世配合，提出「八政各有

三世」之論點以解釋古代歷史之沿革，為後學三世思想之繁複化埋下伏筆。魏源時代與氣運之說相配合亦給予三世思想繁複化提供立論之契機，後世之公羊學者乃自由地運用其本身的歷史觀點，與時代所面臨的問題相結合，提出複雜殊異的三世思想。

康有為為了與其政治主張相配合，其三世思想曾歷經諸多的轉折，在戊戌變法前其秉承傳統三世思想的精義，以據亂進而升平以及於太平：

《春秋》亂世討大夫，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sup>13</sup>

褒貶進退皆為天子之職權，以此說明孔子作《春秋》行素王改制之事，引用單純的「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模式闡述孔子之制作。並且強調三世進化不可躐等的觀念，說明踰越三世進化之步驟將導致悖分亂禮之禍，例如宋宣公於據亂世應將君位傳予其子，卻施行太平世傳賢之法，導致宋國五世篡殺之禍，致使骨肉相殘爭奪君位，《春秋董氏學》謂：

宣公在據亂世時而行太平世之義，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sup>14</sup>

此時康有為將己世定位於升平世，如此始能激勵君主及世人施行變法，向太平盛世邁進，若將己世定為據亂世則過度否定當朝之政治權力，不易勸說君王力行改革，也無法鼓動人民實現太平理想，故以

<sup>13</sup> 見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八「孔子為制法之王考」：「《春秋》亂世討大夫，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9月初版，P.212。

<sup>14</sup> 見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春秋指第一」為善不法不取不棄：「《春秋》義分三世，與賢不與子是太平世，若據亂世則與正而不與賢。宣公在據亂世時而行太平世之義，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1月初版，卷一，P.19。

己世為升平世以利於變法改革之施行，而將治世之理想寓託於太平世之實現。

康有為運用「三統」及「三世」的模式，將據亂世視為包含夏、商、周三統，為孔子力法三世四代的時代。將升平世視為包含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統，各統之間彼此相輔相成。至太平世則為地球各地仍有三統，但各國各取所需<sup>15</sup>。他考察各國的政治現實，又覺得簡單的三世史觀不敷使用，則將三世遞迴成九世的模世，《中庸注》謂：

孔子世為天下所歸往著，有三重之道焉。……重者，三世之統也。有撥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則據亂亦有亂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據亂升平之別。

據亂世之中未開發的原始部落為據亂世之據亂。開發中的土耳其、波斯等有禮教的國家為據亂世之升平。而已開發的美國等先進國家則為據亂世之太平，《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印度土耳其波斯頗有禮教政治，可謂據亂之升平矣。若美國之人人自主，可謂據亂之太平矣。

另外升平世之中也有升平世之據亂，升平世之升平，及升平世之太平。最後還有太平世之中有太平世之據亂，太平世之升平，以及無

<sup>15</sup> 同注1：「康有為的『三世三統』模式（戊戌前）：據亂世內含夏、商、周三統，孔子法四代。升平世內含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統，相輔相成。太平世仍有三統，地球各地各取所需。」P.206。

所不有，不可思議的太平世之太平<sup>16</sup>《中庸注》：

若推三重之道於三世九世八十一世，至無量不可算數不可思議之世，則無所不有，如天之大矣！

這種說法使得康有為所期許的萬世太平的盛世變得遙不可及，最後斷裂為亂世、平世兩極化的發展<sup>17</sup>，《孟子微》：

《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為二，……通其意，不必泥也。……亂世主於別，平世主於同。……亂世近於私，平世近於公。……亂世近於塞，平世近於通。

而寄託於大同理想的規劃，將理想的政治藉大同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而實現。

康有為為了堅持君主立憲的政治立場，主張中國的改革變法不可驟進，所以認為目前世界各國仍停留在小康階段，又將三世模式簡化為二世，使升平成為由亂世升於平世的過度階段，如此，亂世與平世遙遙相隔，而且康有為並未提出任何明確的升於平世的方法，

使亂世與平世斷裂為二，而且亂世的治理方法則愈來愈趨保守，無怪乎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卻退化成阻撓革命，倡言復辟的民主逆流，這是春秋公羊學者過度比附，穿鑿附會的悲哀，也是一位經世致用的熱血志士逐步走向隔斷現實與理想的末世宿命，但春秋公羊學改革變法的火種並未熄滅，公羊學變易改革之思想影響清末中國積極變法圖強進而引發一股改革進化之思潮，並對中國之近代化產生深

<sup>16</sup> 同注1：「康有為的『遞迴三世』模式（一九〇一）：據亂世之據亂，各原始部族；據亂世之升平，土耳其、波斯等有禮教國家；據亂世之太平，美國。升平世之據亂；升平世之升平；升平世之太平。太平世之據亂；太平世之升平；太平世之太平，無所不有，不可思議。」P.206-207。

<sup>17</sup> 同注1：「康有為的『二世』模式：亂世（升平）；平世。」P.208。

遠之影響。

康有為三世思想之演化皆著眼於政治現實之應用，初期以中國歷史中先秦時期夏、商、周三朝之史實，及孔子因時改制之事實，視為據亂世之政治制度。而清朝所處的升平世則有中國之君主及西方之君民共主及美國之民主政治制度，三者制度雖異卻可以互相輔助，參酌取法以改革成適合當時情勢的政治制度。但為了鼓舞君主施行變法，將己世立於升平世，期待天下各國各取所需，努力進於太平之世，故太平世之理想境地亦包含三統，令各國自由應用，以符合各國之政治現實，希望藉此靈活運用三世之思想以解決中西政治情況之不同，共同實現天下太平之理想。繼之又發現單純之三世模式不敷應付現實政治狀況之詮解，乃將三世思想繁複化，以遞迴三世之模式擴張三世之規模，用以解釋世界各國的政治情況，嘗試將各國之政治制度納入三世進步之模式中，以中國傳統之經學因應歷史轉變及現實環境之轉化。最後又礙於太平理想不易實現，各國現實之政治情況也並非如想像中美好，因此，將三世之模式簡化為二世模式，以現世為文明尚未完備的亂世，而升平世隱然變為升於平世之過渡期，而理想的平世則變得遙遠難及，儼然是與現世斷決的烏托邦境界。

奠定今文學地位，且治學多變的廖平，其反對「三世」、「王魯」等義例，也未如以往的《公羊》學者重視三世說，反援引其二統思想以發揮西方所引進的進化論《今古學考》：

學者不察，則附會之說，最易誤人。……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附會以為王魯是也。

《何氏公羊春秋再續十論》：

今于王魯三世，悉加刪改。

將公羊三世思想加以變形，成為今古二統之理論，則是另一種三

世思想之殊異，其今古二統之理論雖為三世思想之殊異但對於中西政治現實境況之詮解並無多大建樹，僅可能提供康有為二世模式之參考。

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亦提出三世繁複化之應用：

《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

利用天地文質三統將三世思想擴充為繁複之模式，以處理各國政治之現實情況。而且自創一個「三世六別」的模式：一為多君為政之據亂世，此世區分為二段，「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二為一君為政之升平世，此世亦區分為二段，「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三為人民主政之太平世，此世也區分成二段，「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sup>18</sup>。不僅將三世思想作一個多種政治型態的應用，並指出三世不能躐等，應依序實施踐履，以及於人民主政之太平盛世，不能跳過任何階段，急於施行現實狀況無法適應之政治模式，所以，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咸以君主立憲為當時清朝救亡圖存之法，強調：「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要世人謹守歷史進步的規則，「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sup>19</sup>一步一步遵循歷史進步之軌跡，實現理想的太平之世。

清代公羊學者即透過各式各樣三世模式以詮解現實存在的政治

<sup>18</sup> 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已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初版。

<sup>19</sup> 同注18：「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次位不能凌亂也。」

制度，藉此說明歷史變易的事實，人類之文明及政治制度之演變都隨著時間推移而變易，因此，變化是歷史的常則，人類亦應追隨歷史之變易努力改革變法，因時而制作，制定出更適合現世之理想政治型態，從歷史變易的借鑑中，因革損益舊有的禮制，參酌現實的需求，朝著太平理想的境地邁進。